

國際視野的 在地實驗

關於國際建築與 都市設計工作營^{注1}

文／康旻杰

無論資源多寡，台灣建築與規劃設計系所近年都將國際化視為重要發展指標，而最能展現國際化的外顯表現，莫過於籌辦或參與國際建築及都市設計工作營。若選擇自己籌辦，一般大學大多只能負擔工作營主帶外賓的差旅及講師費用，但若與國外系所已建立一定程度的交流網絡，即有機會邀請對方師生共同參與，讓不同國家的學生打散重組，在短期而密集的工作營中激盪設計想像。另一種參與國際工作營的取徑，則是直接由老師帶領學生出國，在陌生的學習情境及文化脈絡中打開另類的設計視野。之所以另類，主要是參與的學生往往無法單獨投入設計程序，卻要立即與初認識的團隊夥伴協力合作，從基地訪調分析到設計操作，不斷在溝通協調的過程趨近共識。又因為工作營時間極為緊密，溝通及表達語言的有效性常左右最終的設計成果，對習慣於學期制課程節奏或於熟悉語言環境獨立運作的學生，國際工作營究竟是打通設計任督二脈的捷徑，或是逸離設計常軌的活動幌子，可能還有待評析。但隨著國際設計工作營網絡的拓展，乃至教育部邁頂及相關資源的持續挹注，台灣建築教育確應開始回顧過去幾年工作營式教育範型的實質效益，及所謂國際化的具體意義。

有趣的是，多數匯聚不同國家學生的「國際」工作營都是圍繞著主辦學校所在的「在地」議題、或借重「基地」特殊條件訂定設計主題，而非純概念性的建築形式生產^{注2}。亦即，參與工作營的學員必須迅速消化並掌握田野的知識，才能有效帶入創意思考與議題結合。但為避免可能的語言障礙及異文化衝擊將設



康旻杰
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專任副教授



1. 巴塞隆納工作營所安排的單車城市踏查。

計發展帶入歧途，在地設計夥伴的陪伴與諮詢就益發重要。一方面，國際工作營可被視為全球化建築教育的衍生品，充斥著全球北方（global North）建築與設計學院的夯論述，參與師生的操作通常也環繞著「論述正確」的邏輯建構，深化特定的環境價值與規劃設計取向；但另一方面，國際工作營發生地點的在地性（locality），暴露了其特殊政治經濟與文化脈絡中的當代處境，基地本身既與全球化的結構問題鏈結，又存在著其歷史時勢下糾葛的土地與社會關係。如何透過「國際」重新揭露「在地」，甚而由批判性的閱讀與分析提出原在地規劃設計主流之外的另類空間策略，其實是國際工作營在建築教育外的隱性貢獻。

國際工作營作為全球北方建築與設計範型的輸出，可以往回追溯許多已開發國家的重要建築學院，利用較長時間的假期為學生安排的海外夏日／冬日學校（summer/winter school）或國際設計課程（international studio）。這些網絡廣袤、資源相對豐富的學院在海外建立的設計教育灘頭堡，不僅是正規學分教育的一環及吸引學生就讀的誘因，也是與當地建築及都市發展接軌的非正式平台。參與學生的在地體驗及空間案例深度踏查，儼然是設計學習最關鍵的環節，甚至比技術面的訓練更受重視。但這種海外學習計劃多仍維持單一學院獨立作業，與國際工作營強調議題的跨國分組密集操作過程頗有落差，設計的強度與密度自然也不同。有些設計工作營借用十九世紀巴黎

布雜學院（École des Beaux-Arts）的傳統——以馬車（charrette）在設計期限終了之時到定點收取學生趕到最後一分鐘的繪圖及模型，來描述密集設計的模式。因為期程很少超過兩週，設計生產量又被極大化，design charrette 就成了「設計直到最後一分鐘」的工作營代名詞。雖然一般學期制設計課也常有學生經歷爆肝趕圖到「死線」的噩夢，但密集工作營再將時間濃縮，且所有組員一起趕工，將團隊合作推到極致，甚至集體躍上「馬車」繼續修正（所謂 working en charrette）到跳車為止，又別有一番刺激滋味。

過去幾年間，因臺大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參與了 IFoU（International Forum of Urbanism）的國際網絡，我有幸帶領所上學生參加了幾次 IFoU 在不同城市舉辦的國際工作營，每次都與其他國際建築及設計學院的老師共同擔任一特定組別的主帶，從歐洲到亞洲城市，眼見此網絡持續擴張，參與 2015 年新加坡冬季工作營的學院總數已多達 18 所，或可由此切片一窺國際建築及都市設計工作營的面貌，以及台灣建築及規劃學院參與其中的經驗。

因城鄉所榮譽教授夏鑄九為 IFoU 的創建者之一（其他創建期的核心角色為原任教於 Delft 的 Jürgen Rosemann 教授及北京清華大學的吳良鏞教授），城鄉所師生很早就參與了 IFoU 第一次（2007）在瀘沽湖舉辦的國際工作營，但我個人首次帶學生參加則是 2011 年夏天在巴塞隆納



2. IFoU2. IFoU 北京工作營在天橋北社區的游擊映演行動。
3. IFoU 香港工作營在香港中文大學建築系舉辦。

的城市操作。當時西班牙的經濟問題已經嚴重衝擊到巴塞隆納的都市建設，但城市內更直接影響到市民每日生活路徑與鄰里生活品質的，反而是西班牙經濟賴以維續的觀光產業。巴塞隆納作為西班牙觀光的龍頭，感受尤其深刻。有鑒於此，加泰隆尼亞科技大學（UPC, Universitat Politècnica de Catalunya）所屬之巴塞隆納建築學院（ETSAB, Escola Tècnica Superior d'Arquitectura de Barcelona），提出了 BeSIDES Tourism 的工作營主題，並配合工作營後同樣在巴塞隆納舉行的 IFoU 國際研討會 Tourbanism，從規劃設計及都市研究的雙重角度，探討後工業城市因應觀光發展的種種城市課題。

BeSIDES Tourism 的標題帶有文字遊戲的趣味，既是觀光「以外」的諸多「面向」，又是 B-side Tourism 的諧音。對黑膠單曲唱片還有印象的聽友，或能意會 B-side 所指涉的、A 面流行單曲背面較不引人注意的另類曲目，以及它所象徵的大眾消費文化背後的反／翻面選擇。BeSIDES Tourism 因此想透過國際工作營的實驗另闢都市規劃設計蹊徑，從最外顯的城市觀光據點及區域（尤其是建築師 Gaudi 被觀光客日夜朝聖的文化遺產），轉入週邊的生活鄰里，重新繪製觀光以外的城市經驗，並以此提出設計方案。參與的學院除地主國 ETSAB 及臺大城鄉所外，還包含了同屬 IFoU 會員的另七所學院³。在工作營的策劃下，將巴塞隆納的主要城市軸線由北方的山到南緣的海分成數個連續區

塊，所有師生被刻意打散後重新分組，各自認養一處包含不同土地使用內容的完整區塊。學員們經由在地導覽，從外來觀光者的位置後退，拉出觀察巴塞隆納觀光及其背後陰影的景深，並由關注建築的外觀表象，進一步深入 Ildefonso Cerdá 在 1860 年代擘畫的卓越城市計劃（El Plan Cerdá）。

為期兩週的工作營讓學員有稍微充裕的田野時間，ETSAB 不僅安排了南北向的城市縱走，另透過腳踏車行程將參與者橫向帶往基地外的城市新興區與再生區，乃至進入 Cerdá 經典 1350 街角之十字街廓內的中庭生活空間。這些由在地建築人規劃的路徑，為初來乍到的外地學員快速剖開一道道精彩的巴塞隆納城市斷面，雖還是浮光掠影，卻已能勾引觀察者繼續回頭探索的欲望，甚或可能將感官聽聞帶入設計思考的意識潛層。如我及小組成員重複在基地 Parc Güell 附近翻山行走繪圖，從 Güell 宅邸南側歷史街區內的生活街道及激進佔屋現場，到公園週邊不遠山頂上、視野絕佳且設計干預恰到好處的軍事遺址，到公園後方樹林外的平民住宅群落，我們看到毗鄰高第建築傑作、但退縮於觀光路徑後的真實生活及文化地景樣貌，並決定利用地區新捷運線的站體規劃，縫合被觀光及車行交通撕裂的鄰里空間。

回到 ETSAB 校內的腦力激盪平台，不同學校的主帶老師及學生嘗試將自身所擅長的研究或技術引入設計流程。有些較強勢的老師，仍無可避



免在倉促成軍的組內^{注4}所主導設計概念的發展；但大多仍尊重學生集體討論決策，再提供適切操作方法及頻繁的大桌評圖，協助全組成員通過期中到期末發表的試煉。另就技術面的相互學習，工作營也讓不同學校的學員頗有效率地練就速成武功，如伊斯坦堡理工大學極為嫻熟的影像拍攝及後製，或 ETSAB 師生豐富的在地知識外、對建築設計與工程的專業能力，都對最終的設計生產有顯著的貢獻。

但真正影響全組設計成果的還是學員間自始至終的激烈交流、責任分擔、與團隊合作狀況，這也是對不習慣協力做設計的學生最艱難的挑戰。在巴塞隆納工作營，英語及西語系國家的學生明顯取得溝通及表達的優勢，亞洲國家的學生雖不至於全然噤聲，卻常見討論過程的退縮及默默接受繪圖分工的無奈。城鄉所的學生一向較擅長的結構性分析與參與式設計流程，在短期以英語為主的密集設計工作營難以發揮，尤其單獨散落到不同分組的學生似乎常陷入某種溝通挫敗的窘境。即令參加的 5 人中有 3 人屬建築背景，1 人能以流利西班牙文溝通，另 1 人為都市計劃背景，面臨期中與期末評圖仍苦陷於趕圖的設計焦慮。其中有 1 人勇敢爭取期末代表小組上台發表，但其他人則如同多數亞洲國家學生，選擇退居幕後，讓那些「英文較好的」代言。事後反省，這究竟是文化立足點的不平等或是學員個人個性使然，不

見得能一以蔽之，但國際工作營中的語言情結確實框限了團隊整體設計表現的潛力。

ETSAB 大致也了解團隊默契不能僅依賴密切的設計討論和分工，另籌劃了不少非正式的聚會場合，如一場在當地建築師住家天台的 potluck 晚餐，邀請各國學生自行準備或烹飪具文化代表性的食物，與其他組員一邊分享交流，一邊參觀建築師簡樸卻饒富興味的住家設計，杯觥交錯間讓跨文化分享更自然發生。工作營期間也安插了一些與議題相關或展望巴塞隆納建築趨勢的演講，場地安排卻分別挑選了舊城區內頗具特色的建築活化空間，讓學生在聆聽演講的同時也走進了城市中世紀歷史的核心。這些建築師及演講者都受邀參加期末總評，連同市政府的官方代表及建築學院的師資陣容，見證了所有組別以同一比例輸出平面圖後共同銜接而成的設計成果，開展出巴塞隆納南北軸線在觀光之外的城市想像。

IFoU 巴塞隆納國際工作營是一規劃及後勤都頗為用心的建築教育嘗試，兩週的學習密度很高，對心胸開放、有勇氣突破語言障礙的學員而言，也是開拓人際與專業合作網絡很適當的期程。有學生回顧，學期制的設計課程可更從容分析議題，吸納地方知識與意見，並思辯設計內容的優劣，但時間一長，設計動能起起伏伏，有時反倒比不上密集工作營在合作夥伴及設計期限雙重驅動力進逼的狀態下所生產的質與量。從主帶老師的角度，

即便一開始就約略理解工作營的可為與不可為，但時常在分析階段就會發現令人眼睛一亮、比有些學期制設計課的雞肋資料更深入的閱讀，且一路跟著觀察學生個別和集體的設計發展，竟每每到了總評時還是非常吃驚各組在競爭下所激出的爆發力。其中原因可能隱含了被過程強化的設計快感及合作紀律，甚至巧妙發生的互動火花及團隊精神。至於設計成果與真實世界的距離，就當做是未來在地團隊可藉以繼續推動改變的動機吧。

國際工作營另一種意外的化學效應曾發生在2012年IFoU北京夏日工作營－Urban reDevelopment and Public Transport－有關天橋北老胡同及住宅區因新地鐵線通過和地鐵站闢建而必須面對的再開發設計。因為財務考量，許多歐美的會員學院都無法帶學生遠赴北京參與^{注5}，但還是有幾位荷蘭台夫特大學（Delft）的老師、香港中文大學及韓國全南大學建築系師生、和幾所中國大陸的建築學院加入這次由北工大籌辦的營隊。與巴塞隆納工作營的主要差異是，北京工作營以各種再開發的相關議題而非空間次分區作為分組考量，我與港中大的老師 Hendrik Tieben 被安排合帶一組發展「公共空間」規劃設計的團隊，成員除了1名台灣學生2名韓國學生外都是北工大的學生。適逢北京即將開十八全大會，政治氣氛頗為肅殺，對公共聚集尤其敏感，但在此前提下，該如何以西方公共性的標準討論北京的公共空間設計？參訪過基地後，即使多數學生已磨刀霍霍，準備要分析分析就進入設計概念了，我與 Tieben 決定先以影像計劃操作，讓學生進入胡同，拍攝一系列關於地方的短片，並要求他們必須找到可以放映影片的空間，直接在現地與居民分享拍攝的影片。我們希望學生透過此過程詮釋甚至介入亞洲城市中常見的「協商性公共」（相較於一般理性都市治理下的「指定性公共」），以此基礎探索公共空間的意涵並發展影像計劃後的公共空間設計。

從方法論的角度，這個操作背後其實是主帶老師的價值和意志，但學生接受了建議，拍攝且後製出不少品質出色的短片（其中竟還有一部由孩童掌鏡的特殊作品）；當他們開始尋找兼詢問可被允許的公共放映空間時，才知道這原本被視為北京民間表演藝術及戶外野台演出重鎮的天橋地區，竟需經層層官僚系統申請審核，始有機會在街道廣場放影片。而那些關於街坊的影片，也被公安認為有高度敏感性而堅持要上級裁示才可放行。學生便決定採取游擊映演的行動，從街角到茶館前的人行道，一協商到放映機可借用的插座就當街演出，並立刻吸引路人圍觀。影片中的場景及人物都是街坊鄰居所熟悉的，但在敘事及影像語言的再現下激發了許多共鳴、讚嘆、和討論。學生們這才發現，他們不僅是在設計（designing）公共空間，而是在那個當下創造（making）了公共空間。這前階段的操作影響了全組後階段的圖面設計內容，從設計概念到基地選擇到設計細節，呈現了貼近現存胡同鄰里氣味的品質，在總評時獲得了頗高的評價。

我和 Tieben 覺得成果有趣，決定繼續用同樣方法，但花更長的操作時間在香港和臺北各自實驗，再回頭觀察兩岸三地在面臨都市更新或再開發時，從在地居民觀點及不同城市脈絡比較，公共空間的意義及其生產過程究竟存在何種差異。香港的操作在港島的老社區西營盤，臺北則選擇了南萬華。兩週的北京國際工作營，後來竟在另外的城市發展出一年的實習與設計課程，這名為 Magic Carpet 的計劃成果並獲入選2013年深圳香港都市與建築雙城雙年展（UABB, Urbanism and Architecture Bi-city Biennale），甚至獲邀到義大利波隆那的獨立電影院放映。這是最初策劃 IFoU 國際工作營時無法預期的演繹，但也提醒了密集工作營的時間限制，並無礙於設計行動在真實世界的持續發酵。



4. IFoU 香港工作營的總評及都市新鎮論壇。
5. IFoU 新加坡工作營在國立新加坡大學設計與環境學院雙樓層同時進行的密集設計現場。

我參與的 IFoU 國際工作營還包含了 2013 年冬日由香港中文大學主辦的 Re-do New Town – How to Envision a Home for 160,000 People in Hong Kong，及 2015 年冬日由國立新加坡大學策劃的 Jurong Vision 2050。前者的基地是與香港天水圍隔河相望、仍殘存多處圍村聚落的洪水橋，也是港府正積極推動新市鎮規劃的大規模農業及工業用地；後者則是新加坡為建國 50 週年，籌劃將西南隅龐大的工業用地逐步轉化為可容納一百萬人的再生區域。兩者的尺度都極為驚人，但議題是真實的，兩次工作營都吸引了比北京更多的參與學院及師生。但因基地可及性較低，工作營學員無法經常造訪，多數時間只能依議題的分組留在學校操作。無論十六萬人或一百萬人，乃至基地龐大尺度設下的調查難題和新市鎮規劃所涉及的複雜空間社會問題，都非兩週密集工作營所能真正貼近的。到了總評階段，各式「潮」規劃論述及設計想像力紛紛出籠，為達新市鎮規劃命題而拔高的容積及樓層讓生活社區的討論變得蒼白；倥傯間，竟有種時空錯亂、又見光輝城市（Ville radieuse）幽靈的幻覺。

從正面的觀點，這些國際建築與都市設計工作營，都可視為當代建築與都市論述或特定國際視野的在地實驗。在實驗與真正的實踐之間，由工作營繁衍而生的網絡或許是日後更關鍵的推手。但也別輕忽了，正如許多學生提到參與動機及事後回溯工作營經驗時所言，國際工作營最大的吸引力恐怕還是城市本身。■



注釋：

1. 本文 2015 年 3 月 3 日完成於台大城鄉所，首次發表於《臺灣建築學會會刊雜誌》第 78 期。
2. 當然也有例外，如 2003 年淡江大學建築系配合臺北市立美術館 Archigram 特展主辦的國際設計工作營，仍強調建築與都市概念的啟蒙。
3. 包括成大建築系、美國喬治亞理工學院（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建築學院、伊斯坦堡理工大學（Universidad Técnica de Istanbul, ITU）建築系、韓國光州全南國立大學（Chonnam National University）建築系、委內瑞拉卡拉卡斯 Simón Bolívar 大學（Universidad Simón Bolívar）建築學院、英國曼徹斯特建築學院（Manchester School of Architecture, MSA）、北京工業大學建築及都市計劃學院。
4. 其實工作營的後勤已盡可能在同一學校成員分散的前提下，依照事前學員所填的意向及興趣分組。
5. IFoU 本身無法支助會員學院師生機票及生活費，都必須有參與者自籌或自付。但主辦國家有時透過學校或學院自身的計劃補助，可協助安排便宜的住宿或部分津貼，導覽行程的交通、場地設備、及相關行政後勤費用都由主辦國家負責。